

如何消除社会机制中的黑箱

——基于雷蒙·布东的认知理性理论

How to Eliminate the Black Box in Social Mechanisms:
Based on Raymond Boudon's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李静萱 / LI Jingxuan

(南开大学哲学院, 天津, 300350)
(College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摘要: 雷蒙·布东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 认知理性理论, 目的在于消除解释社会机制中的黑箱。他认为人类理性是唯一可靠的东西, 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要从个人理性出发。由于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决集体信念问题, 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认知理性理论, 认为认知理性行为是解释社会现象的“好的理由”, 黑箱问题也随之解决。然而, 我们发现认知理性理论仍然面临一些困境。

关键词: 理性选择理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 认知理性理论 信念

Abstract: Raymond Boudon proposed a new theory: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aimed at eliminating the black box in explaining social mechanisms. He believes that human rationality is the only reliable th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phenomena must proceed from individual rationality. Because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can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belief, he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He believes that rational behavior is a “good reason” to explain social phenomena, and the black box problem is also solved. However, we find that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still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Key Wor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Beliefs

中图分类号: C916; G322 DOI: 10.15994/j.1000-0763.2025.03.008 CSTR: 32281.14.jdn.2025.03.008

社会现象纷繁复杂, 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如果要对“X如何导致Y”进行解释, 就要探寻社会机制内部过程,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涉及的学科和理论很广, 并且“在社会科学中知识的增长过程是随机的, 而不是积累的”。^[1]另一方面“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更具不确定性, 同一概念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内涵并不相同, 而自然科学理论则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小, 这就导致社会机制中产生了黑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演绎规律模型(The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认为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意味着要找到引起这个现象的规律。规律是逻辑上必要的条件, 如果没有规律的存在, 就无法在无限的事实中找到引起社会现象的原因。但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有背后的规律做支撑, 并且这个模型也忽视了人的行为和意向性的作用, 使规律的确定性受到了质疑。方法论集体主义认为集体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要解释社会现象要通过调查集体行为, 而个人行为只是集体行为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科学哲学中的不充分决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21FZXB061)。

收稿日期: 2023年8月31日; 返修日期: 2025年1月16日

作者简介: 李静萱(1994-)女, 河北唐山人, 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Email: 1014152484@qq.com

副现象,集体作为实体是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的原因。方法论个体主义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个人行为才能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是个人行为的结果,“任何不能归结为个人行为(选择)的社会现象都是一个黑箱”。^[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衡量的理性选择,从而试图为个人行为提供一个没有疑问的解释。然而由于理性选择理论面临诸多困境,社会学家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提出了认知理性理论,把个人理性作为“好的理由”(good reason)来解释社会现象,旨在消除社会机制中的黑箱。

一、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局限性

布东认为我们要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需要诉诸于理性,因为“理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解释方式”。^[1]布东的目标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一个没有争议性的解释,该解释意味着“让它成为一系列陈述的结果,而这些陈述应该都很容易被接受”,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需要把“任何社会现象解释为个人理性行为的结果”。^[1]“理性行为”是可理解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我们不能进一步问出任何问题了,解释黑箱自然消失。相反一个理论如果介入了心理学的力量、生物学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因为这三者背后的机制我们无法打开,其中包含着进一步的问题又需要进一步解释,这样一来又引入了新的黑箱,陷入新的困境当中。^{[1],[3]}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简称RCT)来消除黑箱,这一理论认为“根据行为者的预期结果比较行为,并假设行为者将选择具有最佳结果的行为。在其最明确的情况下,它要求明确所有行动方案的收益和成本,然后假设行为者采取‘最佳’行动,即最大化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异的行动。”([4],p.xi)在此基础上,RCT将人的理性行为定义为由一系列的公理构成:“公理1: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个人决定、行动、

态度的结果;公理2:至少在原则上,一个人的行为是可理解的;公理3:任何行为都是个人头脑中的理性引起的;公理4:这些理性源于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考虑,因为他看到了这些后果;公理5:行为者主要关心他们自己的行为;公理6:行为者能够区分所选择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他们有能力选择最有利的(利益最大)的行为方式。”^[1]

根据这一理论,行为的背后是个人理性对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实现行为选择的利益最大化。例如在18世纪末期法国农业出现了停滞的危机,为了找到其背后的根源,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分析出现农业危机的原因。在法国公务员的声望很高,并且想成为一名公务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法国的地主为了增加收入、获得声望就会选择成为一名公务员,这就导致法国的地主越来越少。没有了地主,农业发展的创新率就会降低,一味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耕种就会导致法国农业经济的停滞。可见,法国农业停滞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衡量了成为公务员的利与弊,不仅可以提高收入还可以提高社会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弊端可言,所以这是一个收益大于成本的选择,从而导致了他们职业的转变,这种转变又进一步导致了法国的农业危机。^{[1],[5]}([6],pp.175-176)RCT给出了18世纪末期法国农业危机原因的最终解释,针对这一解释我不能再问出任何问题了,因为经验陈述与观察数据是一致的,其次对农民、地主的行为给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并且在心理意义上能够行的通。除此之外,理性选择理论还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现象,并且赋予了这些现象一定的科学价值。

布东认为RCT的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社会机制中的黑箱。([6],p.173)^[7]虽然RCT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一些人的行为的确可以通过衡量利益与成本而产生,但是依旧有很多社会现象并不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就导致了一些人把它信奉为真理,而另一些人则并不相信它。例如在投票悖论中,人们的行为就不能利用RCT来解释。^[1]投票悖论是说当一

个人知道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票选的结果时，他依旧会选择行使自己的投票权，给自己支持的那一方投上一票。相反，如果按照RCT理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改变票选结果时，他的行为选择应该是拒绝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入小于回报，RCT会指导人们做出更有利于自己利益的选择。（[6]，p.179）RCT的解释与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所以旨在通过RCT来消除机制黑箱还为时尚早。

再比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感受不到官员腐败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一贯认为贪污腐败是应该遭到痛斥的行为。如果根据RCT，既然普通民众感受不到官员腐败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反对这种行为，因为反对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任何有效的回报；同样剽窃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剽窃行为是令人厌恶的，但是对于行为本身而言，它能够使被剽窃者吸引公众的注意，甚至名声大噪。如果根据RCT，我们不仅不应该反对剽窃反而应该支持这种行为；死刑对大多数人来说影响几乎为零，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对这种刑罚产生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如果是RCT的支持者则认为，这种对自己没有影响的事件，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去发表意见。这三种行为都对个人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有利的影响，但是人的行为选择却没有遵循理性选择理论所预期的行为结果。^[1]

因此，“社会主体对某一特定事件状态的消极反应往往与他们因这种特定事件状态而付出的代价无关。另一方面，在行为者受益为零甚至负面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经常观察到这样的行动。”^[1]虽然RCT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能够对某一现象进行解释，但是却不一定对所有现象进行解释，所以说它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解释力。

RCT不能解释的社会现象有很多，总结起来有三类。^[1]第一类是来源于人背景信念的社会现象。我们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指导我们的行为，对一个行为进行解释，首先要对人们所遵从的信念进行分析。一个人

的信念是他的背景知识的产物，人的理性行为来源于人的认知。我们可以假设，“行为者持有一个给定的信念，因为这个信念是他支持的理论的一个序列。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支持这一理论是一种理性行为。但在这里，理性是认知性的、非工具性的：它包括更倾向于允许一个人以最令人满意的可能方式（根据某些标准）解释给定现象的理论。行为者认可一种理论是因为他相信该理论是正确的。”^[1]但是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我们一旦发现反对某一理论的反对意见使其辩护成本过高，他们就不再相信该理论，这种工具性解释使得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释很多遵循背景信念的现象。

第二类是那些遵循非结果主义规定性的信念。^{[1]，[8]}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只要相信规范性信念，那么就是结果主义者。但是存在着以下情况：选民在不会对选票结果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依然会选择投票。公民反对腐败，即使腐败不会影响到他。抄袭行为会受到蔑视，即使在抄袭行为过程中并没有人受到伤害，而实际上还会提高作家的名气。我们会指责冒名顶替的人，尽管我们知道他们的阴谋只会对自己造成麻烦。这些人都相信规范性信念，但是他们的行为并没有遵循信念所引起的结果，所以是非结果主义的。

第三类是当面对无关乎自己利益的他人的命运时候所作出的行为选择。^[1]（[4]，p.225）读者们之所以会对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进行谴责，同情受害者，是因为读者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剧情的影响，不能直接参与剧情中人物的命运，此时我们做出的判断是不掺杂着个人利益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RCT是不能解释读者的行为的。这是一种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根本不牵连个人利益的情况，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卷入到被判“死刑”的情况中，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论“死刑”。如何才能解释在利益不相关的情况下人们的反应，RCT并没有给予解释，根据RCT如果收益不能大于付出是不会做出任何行动的。对公共事件的舆论是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

是RCT所力所不能及的。

总而言之,“当涉及到背景信念的现象;非结果主义规定性信念的现象;以及无关自己利益的现象时”RCT就失去了效力,“这些想象从事物的本质上讲并不是出于任何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1]而是一种集体信念。布东认为RCT的失败是由于它把理性归纳为工具理性,忽视了认知理性。

二、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超越 ——认知理性理论

RCT解释不了的社会现象是否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很多理论都尝试解释投票悖论:有的人解释为对投票的偏好;有的人认为即使投票对票选结果微乎其微,但是只要能带来一点影响也要进行投票,不然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遗憾;还有人认为,选民投票是因为他们希望所支持的政党获得胜利,有成功导向型的迹象。^[1]然而所有这些解释在布东看来都引入了一个“认知框架”,我们并不能解释其中的奥秘,非但没有给出解释反而引入了“黑箱”,所以以上解释并没有消除黑箱。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机制黑箱,克服RCT的局限性,布东对其进行了理论扩充。RCT利用了公理4、5、6,而公理1界定了什么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公理1和公理2定义了解释社会学,公理1到公理3界定了一种源于理性的解释,即行为的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 Action,简称CTA),也称为“好的理由(good reason)”或认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

个人往往有“好的理由”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并按照他们在特定的背景或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行事。这种好的理由与语境相关,更强调实践规则而不是道德法则。它认为集体现象是个人行为的结果,并且个人行为是可理解的合理的行动。在康德看来,先验判断是必要并且普遍的,但是布东认为这种先验判断既不必要也不普遍,需要从上下文的相关框架中去理解客观性。([9], p.14)布东认为,即使集体行为与个人行为不一致,这仍然是个人行为的结果,

“某些相互依赖的系统促使社会主体采取行动,导致了在他们看来是坏影响。而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个体可以意识到它们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同时又无法避免这些影响”。^[10]集体行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如果集体行为是解释性的,社会现象就可以通过集体行为来解释,那么就忽略了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因素:人的意识。集体概念不能像唯名论一样直接简化为个体概念,而是应该将人类的行为看作是解释社会现象的唯一原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理性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11], p.124)前者强调的是行为者被功利的动机所驱使,借助理性纯粹考虑利益最大化做出行为选择,只关心达到目的的方法,而忽视情感和精神价值。后者更加强调行为的无条件性,利用主观因素去思考,不管结果如何,也没有一个行为标准,关注的是主观合理性。所以韦伯认为价值理性是一个比工具理性更宽泛的概念,创立了价值理论性的概念作为对工具理性的补充。在一些问题上,人们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仍然可以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布东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工具理性,而认知理论是一种价值理性,所以CTA有RCT的优势,并且克服了它的劣势,因为CTA有一个更广泛的理性概念。^[12]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认为“理性本身是目的性或以目的为导向的”,而对“认知理性来说关注的是实现真正的信念”。^[1]根据布东的观点,“社会行动通常取决于信念;信念、行动和态度应尽可能被视为理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被视为社会行为者所认为的强烈原因的影响;涉及成本和收益的理由不应受到过多关注。理性是一回事,预期效用是另一回事。”^[1]同时“人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被原因所感动。但这些原因可能有几种类型。行动可以依赖于信念,也可以不依赖于信念;信念可以是普通的,也可以不是;它们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说明性的。在所有情况下,CTA都假设行动必须通过其对行为者的意义来解释;因此,它假设行为对行为者有意义,或者换句话

说，在行为者眼中，它基于他或她认为强大的一系列理由。”^[1]所以，CTA更能帮助我们消除黑箱。

对认知理性的最大质疑可能源于这样的疑问：人的行动来源可能源于一些错误的想法，这些错误想法可以称之为认知理性行为吗？布东认为，即使是错误的信念也是有很强的理由，并且存在有一定程度的理性。^[11]在科学史中有很多错误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却在科学家的权威下得到了认可。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可能是真实想法的结果，也可能是错误想法的结果。科学家之所以会相信这些错误的陈述，是因为他们在当时有很强的理由去相信理论的正确性，这个很强的理由就来自于当时的认知背景。以太理论曾经也有忠实的信徒，即便如今在我们看来它是已经被证伪的理论。由认知背景产生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的科学陈述一样，在特定的社会主体和认知环境下，具有强有力的理由让我们信服。可能这种错误信念不像错误的科学陈述一样具有说服力，但是即使是错误的信念也是由行为者的认知产生的，在行为者看来是强有力的信念。只要我们参与到行为者的认知环境中，他们的错误想法就很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例如抑郁症会导致自杀，虽然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已经对这种说法予以了否认，但是在医生看来这种信念并不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经常观察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的患者，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曾试图想自杀。在CTA看来是基于强有力的理由的，并且观察者很容易去理解他的这种行为。显然这个例子不能用“利益减去成本”解释，只能用认知理性来解释，行为者追求的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做某一件事的可信度。因此除了理性除了具有工具性维度之外还具有认知维度。

同样的疑问，宗教信仰是认知理性行为吗？布东认为解释社会学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基础上，主张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应该是从宏观深入到微观，行为者的行为和信仰对于行为者本身来说是有意义的，并不是工具性的。^[13]他认为整个宗教学也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原

则基础上，宗教存在的意义存在于社会主体赋予它的意义中。宗教信仰者之所以坚持他们的信仰不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宗教进行了利益与代价的衡量，而是他们的认知理性让他们有理由去信仰宗教。

政治家之所以会被某种宗教所吸引，是因为这些宗教的信仰条款与这些社会人群的社会和政治哲学认知是一致的。^[14]这些宗教的特征都具有一种受更高法律支配的无实体超越的愿景，通过入会仪式将信徒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分级组织。“他们的成员认为，一个社会制度只有在在一个合法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控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且这个权力必须按照客观规则来运作。他们的愿景是一个功能强大、有等级组织的社会，等级制度必须建立在能力和技能的基础上，并根据正式的程序确定，就像罗马和普鲁士国家的情况一样。”^[1]总而言之，在他们看来“官僚”国家的政治组织原则反映了一种有效的政治哲学。相反，对于农民来说“很难接受一神论，因为自然现象的不确定性特征与那些具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的单一意志是不相容的。”^[1]因此，宗教信仰也是一种认知理性，每个人都有强有力的理由去信仰某种宗教，由于自身的处境、认知的不同而信仰不同的宗教。

大多数人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站在RCT的立场上的，事实恰恰相反，在《国富论》中他并没有使用RCT作为解释的基础，而是使用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认知版本CTA。（[6]，pp.188-190）

在18世纪的英国，人们认为士兵的工资低于矿工是正常的。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一种职业比另一种职业的报酬高或者低是公平的呢？亚当斯密认为工资作为对贡献的补偿，同等的社会贡献应该有同等的工资，从风险和训练成本来讲矿工和士兵是相似的，不同点在于两种职业死亡的社会意义不同，矿工死亡被认定为意外，而士兵死亡被认定为牺牲，士兵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和声望。所以只有提高矿工工资才能实现二者的平衡。^{[1]，[15]}

在这个分析体系中，亚当·斯密并没有使用RCT，更像是从原则中演绎出来的。“人们

认为给矿工支付比士兵更高的工资是公平的,因为这种感觉是基于强有力的原则所产生的强有力的理由”,^[1]他们这么做并不是考虑到后果(工人可能会罢工),而是一种直观的方式对他们的信念负责。布东认为RCM是一种工具理性,更加强调实现方式的最优解,而忽略了人的情感,CTA具有价值理性的特征,更多地考虑行为本身的价值,强调动机的纯正性。

但认知理性不对理性进行价值判断,认为真理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甚至错误的也没有一般的标准。在找到更好的替代理论之前,这种理论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当我们认为一种理论是真是假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的理由来判定理论的真假,“但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理论体系的强度”,^[1]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能够确定真理或者理性的一般标准。

总而言之,一个理由系统比另一个理由系统更强或者更弱是相对意义上的,就像真理一样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真理。当我们没有发现更好的理论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现有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如何判断一个理由系统比另一个更强大的标准来自于一个庞大的系统,并且每个问题的答案各不相同。^[1]这种想法不仅在科学理论中适用,在普遍的信念中也适用,因为这一理性理论是根据个人在特定背景或情况下行为的良好理由来定义合理性的。布东认为,与建立在狭义理性定义上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模型相比,这种理论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它保证了非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地位,而不是假设行为者总是或大部分是非理性的。其次,它认识到工具理性是一个并不总是特殊案例。第三,它允许解释一些非目的行为,这些行为是有目的行为的根源。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它通过建立一个比这些学科的主要传统所呈现的模型更现实的模型来调和和社会学和经济学。”([9], p.95)

三、认知理性理论的困境

我们试图去分析认知理性理论的解决思路。布东认为打开社会机制的黑箱,找到其中

的因果关系只能诉诸于人类理性。人类行动的原因基于理性判断,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衡量投入与回报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以此为机制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本质所在。但是由于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一部分社会现象,基于集体信念做出判断的社会现象不能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为了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布东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扩大了理性的范围,提出了认知理性理论。新理论完美地解决了集体信念的弊端,认为理性行为是个人的“好的理由”的结果,集体行为是众多个人理性行为的共同倾向,并且集体行为可能是个人理性行为的无意识结果,所以导致了集体行为与个人行为的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集体行为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最本质的力量是对个人理论行为的分析。

布东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支持者,更具体地说是非工具理性的支持者,重新解释了马克斯·韦伯的个体主义理论,创立了新韦伯范式。^[16]虽然他认为已经揭开了黑箱的奥秘,只需在人类理性中寻找答案,但是无论是从论证的细节和适用的范围,还是在认知理性理论内部都存在一些模棱两可、亟待澄清的地方。

首先,认知理性理论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基础上,缺乏本体论解释。正如实证论科学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任何严肃的知识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常识本体论的基础上,常识本体论认为世界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社会理论应该关注社会客体和过程的特征,无论我们是否决定跨越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边界,理论活动都呈现出一个不容忽视的本体论维度。”([9], p.127)在认知理性理论中,布东需要一个社会结构概念以便去解释理性的社会性的根基特征,并且能够区分实在本身和实在概念。“鉴于社会结构的非经验性,将这一概念建立在牢固的因果关系理论上变得尤为重要,而因果关系理论反过来又建立在现实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9], p.131)本体论认为,实在不能还原为经验现象和它的实际显现,而是指事件的生成机

制，即社会现象发生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即使在实际发生过程中并没有显现任何现象，这种内在的联系依旧存在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因为机制与实际的事件不具有同步性，所以仅凭经验现象和实际现象的连贯特征并不能识别出背后的规律。^[17]所以从本体论上来说，认知理性理论缺乏这样的基础去解释客观实在，从而理解理性的根基性特征。

其次，认知理性理论不能从客观上区分好的理由和坏的理由，从而导致相对主义。^[5]根据认知理性理论，人的行为是基于个人理性产生的，并且具有强有力的理由支持他产生相应的行为，这种赋予个人理性基础性地位的看法就会使我们陷入相对主义的漩涡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即使这个人的行为是如此的荒谬，但是在布东看来，我们不能说错误行为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它依旧有存在的理由。个人行为在理性的指引下产生相应结果，但是有些行为结果是不受理性控制的，甚至与理性行为相悖，比如交通堵塞、房价上涨、美洲大陆的发现、语言的出现、货币的发明等都是行为的无意识结果，认知理性行为并不能给予解释，因为这些都是理性行为最初目的的结果。所以我们无法判断行为的好与坏，所有的社会要求都变得平等，所有意识形态都是政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到质疑的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解释维度，而且还有它的批判性和规范性的作用，社会规范无从考究，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也陷入无序当中。

最后，来自实在论的质疑。根据布东的观点，对象只有出现在语言语境之内，才具有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是反实在论的观点。但是在实在论看来，如果行为的内容被融入到语境中，就导致了在对现实的不同描述之间做出选择的不可能性，行为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则受到了挑战。

结 语

布东并不认为行为人总是以效用或偏好最大化的方式行事，“他也不接受行为人的偏好

（当它们存在时）、动机和信念不应被解释的观点。因此，他的认知理性理论不仅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动理论，而且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信念理论（积极的和规范的），它利用了行动者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或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事情的强有力的理由。”（[9]，p.3）认知理性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假设强有力的理由是客观有效的。布东认为，工具理性只是理性的一个特例，一个现实的行为人模型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计算的基础上，而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和个人构成，包括情感的、结构的和其他约束和资源，这些约束和限制了他们的认知能力。这就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行为主体的信念不可能总是根据现实来明确判断，或者用认识论的术语来说，真理不可能总是已知的。

虽然布东的认知理性对社会机制黑箱的消解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他的工作颇具原创性，他的认知理性理论更加广泛地解释了RCM所不能涵盖的社会现象，道出了RCM的局限性，认为RCM并不能解释集体信念问题，在这一点上布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布东的认知理性理论是对他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的深刻阐释，但是在对问题的解决效力上还值得商榷。总体而言，认知理性理论及其解决社会机制黑箱的方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称得上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的最新理论成果。

[参 考 文 献]

- [1] Boudon, R. 'Beyo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3, 29: 1-21.
- [2] Schelling, T. C. 'Social Mechanisms: Social Mechanisms and Social Dynamics'[A], Peter, H., Richard, S.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44.
- [3] Becker, G. S. *Accounting for Tast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 [4] Coleman, J. 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2.
- [5] Boudon, R. 'More on Good Reasons: Reply to Critic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3, 7

- (1): 87-102.
- [6] Boudon, R. 'Social Mechanisms Without Black Boxes'[A], Peter, H., Richard, S.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203.
- [7] Lehtinen, A., Kuorikoski, J. 'Unrealistic Assumptions in Rational Choice Theory'[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07, 37(2): 118.
- [8] Boudon, R. *The Origin of Values*[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107.
- [9] Hamlin, C. *Beyond Relativism: Raymond Boudon, Cognitive Rationality and Critical Realism*[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10] Boudon, R. *Logic of Social 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1981, 260.
- [11] Boudon, R. 'The Cognitivist Model: A Generalized Rational Choice Model'[J].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996, 8: 123-150.
- [12] Boudon, R. *Raison, Bonnes Raisons*[M]. Paris: PUF, 2003, 99-122.
- [13] Udehn, L.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Background, History and Meaning*[M]. London: Routledge, 2002, 306-307.
- [14] 马克斯·韦伯. 宗教与世界[M].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60-461.
- [15]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5.
- [16] Alban, B.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Facing Recent Criticisms from Analytical Philosophy'[A], Nathalie, B., Francesco, D. I. (Eds.) *Palgrave Handbook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7-8.
- [17] List, C., Spiekermann, K.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 Reconcilia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107(4): 634-635.
- [18] Boudon, R. *The Crisis in Sociology: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